

(2) 古籍保存环境亟需改善。对“申报书”中 277 个古籍书库* 的保藏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大多数条件比较简陋,具体表现在:多数古籍书库的温湿度不稳定;防紫外光与防空气污染环节薄弱;为数不少的古籍书库甚至连最基本的保护设施都欠缺(见表 2)。需要指出的是,调查所反映的问题并不仅是书库简陋问题,还涉及到相关管理问题。

表 2 中国古籍保存条件分析

类 别	相关措施	目 的	统计数据	
			数量(个)	百分比(%)
空气调节	安装有空调系统	温湿度调节	128	46.21
	安装有空气净化设备	提高入库空气质量	21	16.67
光线调节	有防紫外装置	降低光的危害程度	7	5.56
温湿度监测	有温度、湿度监测仪	检测库内不同位置的温度与湿度	77	61.11
	无温湿度监测仪		44	34.92
	只有温度监测仪		3	2.38
	只有湿度监测仪		2	1.59
消防与安防	有水灾自动报警系统	库内水害报警	25	19.84
	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库内火灾报警	97	76.98
	有库房监控报警系统	防盗报警	89	70.63
	有自动灭火系统	及时扑灭火灾	85	67.46
	有“灾害预防应急措施”	灾害预防应急处理	48	38.10
治理	消毒、杀虫	去霉杀虫	81	64.29
	有古籍修复人员	修复古籍	46	36.50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 保护古籍的意识与责任感不强。认真研读“申报书”发现,经费拮据虽然是制约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因素,不重视古籍实体保护是古籍保护难以切实推进的症结。特别是对古籍保护具有资源配置的权利部门缺乏保护古籍的意识,责任感不强。一些并非不具备经济实力的古籍收藏单位也缺乏基本保护设施,古籍处在恶劣的保存环境中。我国大多数古籍都保存在公藏机构,其主要领导对保护古籍的责任感应是调动本机构一切积极因素投入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保证。鉴于此,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角度,国家、地方政府的相关行政管理机构应出台保护古籍的问责制,对那些轻视古籍保护而造成古籍明显损坏的过失,应追究领导责任。这可提高古籍收藏机构负责人对本机构古籍保护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将古籍保护政策与措施落到实处。

(2) 古籍保护知识薄弱。主要表现为对古籍实体保护、书库温湿度控制、本行业古籍保护标准、虫霉防治以及光危害等问题认识不到位或存在误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图书馆专业的学生大多都没有修习过文献保护学课程。这并非与兴趣相关而是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影响。关心古籍保护的人少,相关人才的市场需求就小,学校(包括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大纲中设置文献保护学课程的就少。要根本改变轻视古籍保护的状况,加强相关教育,就只能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要求图书、档案、资讯管理等相关专业将文献保护学列入必修课程。

(3) 相关管理工作跟不上古籍保护的需要。古籍收藏单位有关古籍保护的很多管理工作,如书库环境调控、各项指标的记录与检查、杀虫消毒、安防消防与修复管理等,都亟需规范化与制度化。比如古籍书库的温湿度控制管理制度,目前大多数古籍收藏单位

* 126 个古籍保藏单位中,共有 277 个古籍书库。

— 9 —

空气调节设备都没有持续运行,大多数单位根据工作人员作息时间间断使用空调,而不是“按季节开机”或“视情况开机”。如何让现有的管理制度满足古籍保护需要,是各古籍收藏单位应当思考的问题。

2 保护中国古籍的战略建议

2.1 关于古籍保护理念与人才培养战略的建议

保护中国古籍仅靠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是难以实现的,它更需要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入手,营造一个以中华文化为荣、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关心与关注中华文化存亡的社会氛围,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古籍保护工作提供政策护航和财力支撑,古籍保护从业人员才会有安心本职工作的市场环境。为此,笔者建议:

(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纳入基础教育课程。当前我国古籍工作重用轻藏、重发掘轻保护,均与文化遗产意识淡薄相关,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建议政府与教育部门将文化遗产的作用与重要性纳入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并使其融入政治、历史、语文、地理等教科书,从小培养学生的中华文化情怀和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这样将有助于提高国民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也是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只有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得到提高,才能为古籍保护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

(2)将文献遗产保护纳入相关专业的必修课。对学生进行文献遗产保护的理论知识与基本方法的教育,是图书馆学、档案学以及信息管理等专业学生所必备的基础知识。长期以来,用人市场对学生的从业综合素质重视不够,许多学生的学习动机主要是“求职需要”,出于个人兴趣的只占5%左右^[2]。学校则片面追求就业率与选修人数,在大多数学校的图书馆学、信息管理专业,文献遗产保护学被学生认为是“无用”或“不热门”的课程,因而逐渐从必修转为选修,最后由于选择人数过少而被剔出教学大纲。

学校教育固然要服务社会,也要指导社会、塑造社会,提升全社会人文水准。学校的短视行为需要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加以拨正。在当前情况下,只有将文献遗产保护列入必修课程,才能促使大多数学生去学习,才能保证古籍管理的后备军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

(3)与教育界合作培养多层次的古籍保护人才。我国古籍保护人才的需求与培养上存在一个怪圈:一方面古籍保护专门人才、特别是修复人才紧缺;另一

方面愿意培养这类专门人才的教育单位太少。

古籍保护专门人才多属应用型人才,可采用“定制”与“联合教育”的方式来培养。所谓“定制”,即实行订单式培养模式,按照古籍收藏机构的人才需求为其“定制”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并根据工作岗位的能力要求确定相应的教学方式,实现人才培养与古籍保护需要零距离对接。而“联合教育”是指古籍收藏单位与教育培养单位通过合作研究、互聘教师和共建实习单位等方法开展全方位的教育合作。这两种办学模式不仅可以消除教育部门关于“就业率”的担心,也便于参照古籍收藏部门需求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确定教学模式。

教育单位对人才的培养都是有层次有目标的。古籍修复多以技能为主,大多依靠中职与高职培养的人才就可胜任。而图书馆却要求招收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来修书,这本身就不符合教育规律。而且这些人在校受教育的重点并不在职业岗位技能上,因此也难以胜任技能性工作。图书馆花大气力对他们进行技能再教育,结果其中有多少人能长留在该岗位就难以预测了。

中国教育界的另一个尴尬是高职高专院校纷纷“升本”,其根由仍然是就业压力。“升格”后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了适应本科层次人才培养要求,不少放弃了自身多年的、适于技能培养的教学优势。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一连锁反应的后果并明确表示,到2010年中职教育招生规模要从2004年的560万增加到800万,与普通高中规模大体相当^[3]。我国古籍收藏机构应抓住这一契机,与高职高专院校以“定制”方式培养古籍修复人才,为他们提供师资力量和实习机会。学生毕业合格,直接接收就业。

若古籍收藏部门需求本科以上的古籍保护研究型人才,还可以通过与高校的科研合作创建高级人才培养的平台。这类合作也能使教育部门培养的高级研究人才更适合相关研究的需要。这种联合教育方式,特别适于我国刚刚兴起的国家与地方古籍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人才培养。

(4)加强古籍保护工作人员的在职培训。学历教育难以缓解我国古籍保护人才匮乏的当务之急,即使今后古籍保护人才配置合理后,仍然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提升在职人员的古籍保护水平、更新古籍保护知识,因此古籍保护工作人员的在职培训应当具有长期性。我国国家与地方古籍保护中心的建立,为古籍保护在职培训创造了条件。

古籍保护培训应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培训内容应当涉及古籍保护的所有方面,包括古籍修复、库房技术管理与杀虫消毒等;另一方面是培训不仅应面向基层工作人员,还应包括领导干部。只有相关的行政管理干部与领导明确了古籍保护的重要与需求,古籍保护工作才可能

顺利开展。

2.2 关于古籍保护经费投入的建议

文化是无价的,古籍保护没有经费是无法展开的。古籍保护是一项长期工作,其长期性特别体现在对其实体保护的经费投入上。表3列出了古籍保护经费的主要构成和资金投入的时间特性。

表3 古籍保护费用的主要构成

	古籍实体维护费用				古籍内容保护	抢救
	保藏环境调控	安防与消防	修复	杀虫消毒	数字化、复制与再造	搜集、整理
目的	延缓古籍老化	防御灾难	抢救,使其形体完整,字迹清晰	预防与杀灭生物危害	使其内容为更多人长期使用	减少古籍流失
时间性	长期、持续与适时	一次投入,长期维护	长期性	长期备用	项目性	长期可能

在古籍保护经费投入上,首次需求的费用是巨大的,但是必须的与启动性的。首次投入费用的总需求与投入的时间相关。延迟投资会造成更多古籍被损坏,其实体保护费用和内容保护费用要相应付出更高的代价,古籍也将面临更大的损坏风险。在保护古籍的基础设施(书库建筑的隔热绝湿及密闭设施、温湿度与光照的调节设备、安防、消防与杀虫消毒设备以及修复设备等)到位后,后续的保护经费投入不会太高,但是必须持续。若忽视了这项持续投入或是没有将其列入专项费用,就很可能造成保护环境的再度恶化而必须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古籍抢救。为此建议如下:

(1)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应尽早并优先为古籍保护基础设施提供专项经费。由表2可见,我国大多数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保护基础设施难以保护古籍实体安全。若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古籍将修不胜修及至无法修复。要尽早改变这一状况,只有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投入是最可靠的。政府应及早拨专款用于古籍书库的改造,使其中古籍早日避免恶劣外界环境的侵蚀。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投入环境调节与灾难风险防护设施费用。

(2)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应拨专项古籍修复抢救费。由表1可见,我国古籍的损坏极其严重,若不及时抢救,有些古籍可能将继续加速恶化甚至无法修复。在修复资金使用上,建议按以下优先原则安排:

① 优先抢救酸化古籍。酸化与脆化的古籍若不尽早进行脱酸处置,酸对纸的破坏会加速。脱酸虽然不能解决书页的脆化,但脱酸后再修复的书页会保持

较长时期的稳定,不会出现像未脱酸先修复的书页那样修复后还会继续加速恶化的现象。故在所有的修复之中,脱酸是重中之重,应予以优先投资。建议国家投入一定资金购买国外已经成熟的脱酸专利产品,对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酸化古籍进行抢救处理。政府应设立应急科研基金支持国产脱酸产品的研制,该产品确实安全可靠后,方可用于我国古籍脱酸。

② 优先修复脆化书页。脆化的书页若不尽早设法使其固定,今后的修复就会更加困难。对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脆化书页应优先投资抢救,防止书页碎裂而导致内容丢失,造成无法挽救的损失。为积极地解决我国古籍修复中的各种问题,建议国家科技部列出专项科研经费,鼓励创新修复技术,积极支持针对急需解决的古籍修复问题的应用型科学研究。

(3)国家应保障古籍保护经费“单列”、“单拨”。我国绝大多数古籍都被公藏机构集中保存,而这些公藏机构的主要资金是来自于政府机构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拨款,或是地方政府的税收^[4]。为保证古籍保护经费有固定的财源,不至于由于各种原因被挤占、挪用,国家必须以法规或其他行政干预的手段使古籍保护经费“单列”或“单拨”,使古籍保护经费投入规范化、制度化,保障古籍保护经费落到实处。

2.3 关于调研督查指导与降低古籍保护风险的建议

不少古籍收藏单位已经使用多种设备、采用各种措施来维护古籍实体的完整与安全,但是否都有成效,存在哪些误区,还需要组织督导与专家调研,总结不同地域、不同层面古籍保护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供古籍收

藏单位分享以降低风险、减少失误,为积极、稳妥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古籍保护工作打好基础。在调研中,特别要注意对以下方面的问题进行摸底与探索:

(1)带普遍性的问题。在我们的统计对象中有61.11%的古籍收藏单位为某些古籍书库配置了各种类型与型号的空调设备,与此同时,有37.65%的空调书库温湿度恒定在标准范围之外;33.59%的空调书库温湿度无法恒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类问题出现?这些设备效果如何?与书库是否匹配?哪里存在问题?针对这些具体问题还需要展开经验性调查,以便及时研究与总结。随着国家和政府对古籍保护的重视,不少古籍书库的新建、改建与扩建工程正在进行,一旦建成后,许多古籍收藏单位都将考虑配置恒温恒湿设备。各地古籍收藏单位对这类设备的使用经验与教训,可供一些准备使用或考虑选用的单位参考,有利于减少和避免失误,降低风险成本。

(2)带争论性的问题。对于一些有争论性的保护措施,尤其要加强对策性调研,特别是针对争论焦点进行深入考察,以寻求合理的、最佳的解决方案。例如:

①古籍书库是否需要配置自动灭火系统。自动灭火系统作为评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必须配置的设备之一,其重要性是大家公认的;但自动灭火的可靠性、对人的安全性及误报、误喷等问题又是大家所担忧的。因而,针对我国古籍书库是否必须配置自动灭火系统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在我们的统计对象中,有67.46%的单位已经使用了多种自动灭火系统,我国古籍保护专家组应对使用这些灭火系统的单位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察,对争论焦点和潜在的问题予以重点调查。在初步形成调查意见的基础上,征求广大古籍收藏单位的意见,必要时还可与厂家进行交流和讨论,使形成的意见有效可行并具有可推广性。

②某些传统杀虫驱虫方法的有效性。通过调研发现,有较多的古籍收藏单位是采用传统的杀虫驱虫措施的。针对这些措施在某些文献中可以找到较多的不同观点和意见,主要集中在其对昆虫的毒杀与驱赶效果方面。对这类问题需要调研后加以分辨,若真不妥时要尽快加以处置,以免酿成较大失误。

(3)带倾向性的问题。现在有些古籍收藏单位开始使用密集架来保存古籍,也有古籍收藏单位采用保险柜、铁质档案柜等铁质柜架来保存古籍。我国档案馆普遍推荐使用密集架,但这类铁质装具是否适用于具有文物价值的古籍还需要通过调研来商榷。

具备消毒杀虫设施是作为评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条件之一,很多单位都将要考虑这类设备配置。当前有相当多的古籍收藏单位采用冷冻、抽真空除氧以及微波等物理方法杀虫。物理杀虫不污染环境,是一种发展方向,但这些设备的杀虫能力与效果如何还有待经验总结。特别是冷冻杀虫,若温度控制不到指定的低温与持续时间,其杀虫特别是杀虫卵虫蛹的能力有限。现在使用的各种冷冻杀虫工具如超低温杀虫设备、商用冰柜、医用冷冻箱等,是否都能达到冷冻杀虫的低温,冷冻杀虫操作是否都考虑到冷冻的持续时间,其效果究竟如何都需要深入考察。

2.4 关于创建中国文献用纸产研基地的建议

(1)中国重要文献资料需要使用中性纸印制与保存。为避免重要文献与学术期刊无法传世,国外许多国家在20世纪就开始要求必须采用中性纸印刷重要文献与学术期刊,并将其作为出版界的行规。具有长期利用价值的文献,特别是那些可能传世的文献需要尽早采用中性纸印制,这点必须引起我国出版界的关注,也需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干预。

(2)古籍修复用纸难以寻求。古籍修复的目标是:在保持古籍原有特征的前提下,经修复后应达到或超过原件的耐久性^[5]。因而选择古籍修复用纸极为重要,正如台湾同行一句名言“用对一张纸,文物新契机”。由于寿命短或纸性不符,不恰当的修复用纸先古籍损坏而损坏,或带来古籍的再度伤害,反而有害于古籍。

由于自身经营不善与市场经济影响,国内传统纸张生产日渐匮乏,有些手工纸厂已经倒闭。而受经济利益诱惑,已有的手工纸质量也很难满足古籍修复用纸的要求。为此笔者建议创建文献保存与修复用纸研发中心。该中心的创建是具有市场基础的,当代重要文献的印刷用纸,古籍、纸质文物与古籍修复以及档案修复用纸等都是其重要的市场基础,但其是否可以成功运行取决于两点:

一是需要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并制定措施迫使出版部门将重要文献用纸限定为中性纸。同时,国内古籍修复要坚持“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的理念,杜绝破坏性修复。

二是商业诚信与合理经营。手工纸成本高、质量要求也高,而修复用纸远比其他文化用纸需求量少得多,这是许多企业的担心所在,主要产品为手工纸的台湾中日特种纸工厂的经验可为我们借鉴。该厂具有专门的研发团队,不仅生产手工纸而且研究修复用

纸,并为古籍量身定制修复用纸,在纸面光滑度和薄度方面均有重大突破。用这类超薄修复纸进行修裱工作,不仅透析度高可保持文字原貌,还可减少修裱后书页厚度,因此很受博物馆、图书馆与档案馆的欢迎,在台湾“适应市场能力强,经济效益很好”^[6]。

创建中国文献用纸产研基地,不仅可生产与研究文献修复用纸,其传统造纸的手工艺还可成为宣传中华文化的观光之地。国外许多纸张生产商也看准了这一商机,发起了中性纸张的生产运动,例如加拿大许多纸张生产商就曾与加拿大保护研究所等文化机构合作,共同研制适用于保存重要文献的纸张。此外,澳大利亚、德国、日本、荷兰、瑞士等都有这类实例^[7-8]。因此,创建我国文献用纸产研基地是必要和可行的,也是保护更多重要文献和今后可能成为古籍的文献的重要战略。

参考文献:

[1] 古籍修复难题亟待突破[N].南方日报,2007-10-13.
 [2] 大学生,莫患学习“短视症”[N].新闻观察,2005-01-4(科教卫版).

[3] 谈中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OL]. [2008-01-08]. 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fangtan_050926_liuzs.jsp
 [4] 徐娜. 图书馆开拓经费来源之我见[J]. 图书馆建设, 1999(3).
 [5] 刘家真. 文献保护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339-340.
 [6] 李忠正. 台湾造纸工业访问见闻[J]. 纸和造纸,1998(2).
 [7] 树火全球资讯[OL]. [2008-01-08]. <http://www.su-hopaper.org.tw/chinese/otherlinks/otherlinks.htm>.
 [8] 刘家真. 文献遗产保护[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刘家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邮编 430072。

程万高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2008-01-10)

(上接第7页)

5.3 灵活的体系结构

Fedora 存储系统已经被设计成为适用于整合的系统。围绕该系统成长起来的团队就是它成功的证据之一。VITAL 系统以及 Fedora 与 VTLS 图书馆管理系统整合的实例都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之一。

5.4 模块化

模块化的成功实践是 OAI 扩展,它能够支持对象的再利用和交换(OAI-ORE)。正如 OAI 网站所提出的那样,它们致力于开发一系列规范,实现分布式数据库之间数字对象相关信息的交流。这些规范包括数字对象标识方法以及便于存取和吸收数字对象的数据库服务方法。这些规范将促使新一代的交互式数据库服务产生,这种服务能够发挥分布于不同地点的数据库中数字对象的内在价值。我们对此抱有很大期望,期待变革能够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6 结论

当前,图书馆是一个承担了一系列资源管理(既包括纸质资料管理,也包括数字信息管理;既包括本地信息管理,也包括远程信息管理)职责的组织,这

些管理行为能够支撑日渐成熟和发展的网络服务,从而使用户能够有效地发现和使用他们有权使用的信息资源。图书馆必须改变对于技术的思考方式,对技术进行战略上的合理部署,把握相关技术之间的有机联系。目前,由于纸质资料的固有属性以及图书馆发展的历史原因,图书馆可能会被大量的本地纸质资料管理所牵绊。但是,与此同时,图书馆必须熟练掌握数字信息管理方法,并将数字信息管理的各个流程(例如接收、公开、传递、利用等)以及能够实现这些流程的最佳工具进行概念化和标准化,最终为构建数字图书馆服务。

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分别面临着许多不同的基础性问题,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却有相似之处。我希望,我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能够对档案领域也有所裨益。

John Wilkin 美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何欢欢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地址: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邮编 430072。

(收稿日期:2008-05-22)

●李林华 金明生

理性与我国科学图书馆学的构建^{*}

摘要 理性是科学的内核,科学是理性之外现。目前,我国图书馆学尚处于形而上学阶段,与具有独立学科意义的科学尚存在一定距离,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缺乏理性精神。科学图书馆学的抽象性、理论构建及其研究方法,都需要理性来把握。理性分为本体理性、认知理性、价值理性、方法理性四个层次。科学图书馆学也应从这四个方面去构建。参考文献29。

关键词 理性 图书馆学 学科构建 本体理性 认知理性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Rationality is the inner core of science, and science is the outer look of rationality. At present,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s at the stage of metaphysics, and cannot be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science. The reason is the lack of the spirit of rationality i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The abstractnes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a scientific library science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rationalit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ontological rationality, epistemologic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and methodological rationality. 29 refs.

KEY WORDS Rationality. Library scienc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ntological rationality. Epistemological rationality.

CLASS NUMBER G250

1 中国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一项未竟的事业

“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1],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实质上涉及对“科学是什么”的理解。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认为无法给科学下一个合适的定义,而只能从不同侧面去理解。他指出:“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系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2]这个定义揭示了科学的若干基本特征:①构成科学的基本成分是知识,而知识是具有一定抽象性、规律性和洞察力的认识,是对经验材料进行概括与升华的结果;②科学是由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并遵循严格的逻辑法则所推演出来的具有一定内在结构的知识体系;③科学需有正规、可靠的方法为基础。从这些意义上理解,目前的图书馆学还包含着非科学的组分。

那么,我们时下所言的图书馆学又是指什么呢?笔者较赞同蒋永福先生的观点——“所说的‘学’,指的是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专门研究,而不一定就是指独立、完整意义上的‘学科’”^[1]。也就是说,目前图书馆学还包含大量经验的成分,还是一门“经验科学”,离一门具有学科意义的“本质科学”尚有一定的距离。我国图书馆学从20世纪20年代自西方引进

以来,将近90年的历史,而图书馆学至今尚没有实现科学化,没有在现代学科之林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受到界外的漠视与界内的质疑,这不禁使业界迷惑:我国图书馆学到底缺少什么?理性是科学的内核,科学是理性的外现^[3]。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科学事业是一项理性的事业,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代名词。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至今还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过程中理性精神的匮乏。

2 我国图书馆学科学性的理性审视

2.1 理性

在哲学的认识论中,理性是与感性相对的概念。《辞海》对理性的定义为:“认识的高级阶段,指属于概念、判断、推理阶段的认识。它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思考的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4]“理性的本质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5],理性作为人所特有的思维能力,它以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为基本思

^{*}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7N35)阶段性成果之一。

维形式,是对普遍必然性的追寻和确认,其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寻求真理,获得真理,而科学的目标也就是要实现关于世界的真的认识,因而科学与理性具有内在统一性,科学事业是一项理性的事业。

“称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6],欧洲启蒙思想家正是大胆使用人的天赋理性,高扬理性的旗帜,以人为本,打破了神学的绝对权威,以理性为武器维护了人的尊严,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在对人性追求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也以理性的归纳和演绎为基本的思维方式,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推理等理性方法,去发现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推动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7]而我国学者在对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求解,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缺乏^[8]。

2.2 理性与我国图书馆学的抽象性

中国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沈祖荣、胡庆生等一批留美学者归国,他们办学校,创建图书馆,并掀起了以“教育救国”为思想基础的新图书馆运动。他们初步建立了近代图书馆体系并促进了图书馆管理的科学化。然而,受欧美特别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他们局限于图书馆内部业务的分析。20世纪50-60年代,受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难以避免苏联式的“泛政治化”的倾向,图书馆理论的研究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

在开启国门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滚滚而来。我国图书馆界开始了自动化管理的开发,后来又出现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技术浪潮经久不衰,图书馆学的研究出现了泛技术化的倾向。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热衷于技术的介绍与经验的总结,往往囿于某一局部现象的一般描述而无理论上的升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这种实用——技术的思潮,使图书馆学经验色彩浓厚,缺乏科学推导,缺少逻辑论证。图书馆学长期停留在经验层次上,研究工作的内容表现在收集资料,分类整理,定性加工,并用自然语言描述出来。图书馆学长期为一种“经验之学”。经验的概括,描述性规律不是科学,而是前科学的认识方式^[9]。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次次高潮没有实现我国

图书馆学的科学化。

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普遍性。理性的作用就是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因果关系,来把握这种抽象性与普遍性。要使图书馆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让图书馆学成为人类对客观知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需要对感性经验进行理性的分析、抽象、综合,从中升华出科学的定义与命题,并进一步形成科学的理论。没有以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特征的理性形式,是不可能获得科学图书馆学的抽象性与普遍性的。

2.3 理性与图书馆学理论的构建

从西方引进图书馆学以来,我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定义、本质、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体系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构筑了以文献为核心、以信息为核心、以知识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从文献到信息再到知识也是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的对象与本质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科学理论是一些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10],理论的形成过程是在概念、原理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判断与合逻辑的推理过程,从而推演出“应当如此”的结论。从理论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理论的形成正是理性思维——判断、逻辑、推理等发生作用的过程。而理论作为结果正是理性思维自然而然的一种产品。而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基本概念如信息、知识,都是在社会大背景下匆忙引入图书馆学并赋予新的学科含义,没有遵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自然规律,这一点突出反映于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仓促性与非自为性,凸显了图书馆学发展的先天不足。

从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我们又似乎把理论当成纯粹思辨的产物。大多理论都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观与臆想,出于研究者的体验与理解,所构建的只是一种思辨理论。这种思辨理论用纯粹的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这正是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理论的前提具有假设性,理论“以假设的概念和公理为基础”^[11]。理论前提的假设性必须通过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性,可检验性是科学的重要特性。而基于思辨的图书馆学理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否,具有模糊性与歧义性,难以进行检验。

这种思辨理论造成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虚化与泛化,它既不能合理地解释现实,又不能科学地预见未来,难以发挥理论的作用;它脱离现实,难以找到与实践沟通的桥梁;它是研究者个人的随意性行为

……不被图书馆工作实践所接纳”^[12]。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认为,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历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用超自然的力量——神来解释世界;形而上学阶段,用“抽象的实体”来认识事物;科学实证阶段,把推理和观察相结合去探索现象背后的实际规律^[13]。按孔德的科学三阶段规律,目前我国图书馆学还处于形而上学阶段,与真正的科学尚有一定的距离。

2.4 理性与图书馆学方法的科学性

一门学科的发展史其实也是这门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史。鉴此,图书馆学研究者致力于图书馆学方法的构建,除了利用现成的方法外,还介绍、移植了大量其他学科的方法,并对其进行了尝试性的整合。从表面上看,图书馆学似乎建立起完整、严密的方法体系,但从现实看,图书馆学研究中实际应用的方法极为有限。在实际工作的概括与总结中,经验描述方法为主要方法;在图书馆学理论构建中,思辨方法又是主要方法。正是研究方法的非理性(即诉诸直觉、顿悟等),使我国图书馆学在一次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高潮中,在业界一次次的“图书馆运动”中,错过了科学化的机会。

理性作为思维能力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应用于一定的社会客体,则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方法。“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14],任何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式都是有限的,都是通过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比较与概括、具体与抽象等理性方法来实现的。芝加哥学派领导了西方图书馆学科学化的历程,就在于他们成功地把当时社会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引入了图书馆学,给以经验技术为主导的当时的美国图书馆学补上了“近代科学方法论”这一基础课。“他们是从图书馆外部的视角选择和社会紧密联系的研究课题,并采用内容分析、田野调查、调查统计分析等社会学的最新实证研究手法分析图书馆问题。这些研究都是严格地按照经验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即强调定性或定量的数据基础,强调研究者的客观和中立的研究立场,强调科学的分析技法,强调研究结论的可验证性。”^[15]我国图书馆学发展至今,尚处于经验科学、形而上学阶段,没有完成科学化的历程,忽略了图书馆学科学化关键的一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3 从理性的四重向度构建科学图书馆学

理性概念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西方哲学对理性的理解来看,大致可以

把理性区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16]:本体论意义上的本体理性;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理性;价值论意义上的价值理性;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理性。科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构筑科学的图书馆学也需要从理性的四重向度来把握,即探究图书馆学的本体、图书馆学的本质与规律、图书馆学的价值、图书馆学的方法。

3.1 图书馆学的本体

本体理性源于对世界本源的把握,把理性视为“宇宙之根源和世界之灵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17]。本体理性着眼于理性的本体观和本体意义,探索世界的本质和宇宙的本质,寻找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现象背后永恒本体和终极世界的存在。本体论意义的图书馆学,意味着确定图书馆学的实体——图书馆进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其研究范围和方向,也决定着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尽管人们的研究视角不同,提出了各种图书馆的定义与研究对象,但从总体上来看,图书馆学界已经从文献到信息再到知识,从知识角度来把握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在知识的长链中,形成了知识社会说、知识交流说、知识组织论、知识集合论的知识链条。“图书馆是客观知识组织与记忆的社会组织”^[18],“图书馆是公共知识中心”^[19],以知识为核心来把握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与定义图书馆已经成为共识。

3.2 图书馆学的本质与规律

“认知理性则是专注于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追求未知领域的知识真理和探索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是理性的求真本性的完满体现。”^[17]作为认识论向度上的理性,是一种对获得外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形式。我国对图书馆的认识,以往大多是把图书馆学作为一种“馆内科学”,从内部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方法着手,研究的是图书馆具体的工作与管理,遵循的是一条机构导向的研究思路。如今,虽然有学者开始从图书馆外部认识图书馆的本质与规律,但图书馆学研究整体还没有提升到这一高度。作为客观的现实的图书馆本身,仅研究其工作技术、工作方法与工作流程,显然不是本质规律性的认识。

“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记忆中去的社会装置”^[20],“社会是图书馆的支柱,反过来,图书馆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并对其负有责任”^[21]。图书馆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是人类客观知识记忆的场所及

客观知识主观化的中介,因而图书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对群体特征和活动的持续的社会学研究是确保每一个社会机构改革成功的唯一安全指南”^[22],这一观点对于以机构为导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要突破图书馆机构范畴,将其置于社会之中进行考察,从外部来探索其作为一个社会知识系统的功能及其实现。图书馆学只有将其注意力从过程转向功能,研究人的知识信息需要及其满足机制,人们才能从学科的层面来认识图书馆现象。也就是说,图书馆学研究要真正转移到知识的序化以及用户的需要上来,研究其客观规律,遵循一条知识(图书馆的本质特征)——社会存在(知识交换的中介,涉及到图书馆的社会性)——人(图书馆学的目标)的逻辑线路,并真正以这条逻辑线路来演绎我们的理论体系。

3.3 图书馆学的价值

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23]。价值理性是强调理性的价值理想目标和价值评判标准,其内涵包括人性论(人性、人道、人权)与精神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和真理)。它表示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效用的范畴,并反映了客体的属性与主体的需要之间的特定的关系,涉及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科学“应怎样”的问题。价值理性体现在图书馆学中,主要是图书馆学的人文精神与图书馆的价值目标问题。

在图书馆人文精神研究方面,图书馆学从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历史到人文精神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实现,已经构筑起较完整的人文图书馆学体系。图书馆人文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以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体现人文关怀,创造美与和谐为图书馆的宗旨”^[24]。在图书馆价值理想方面,认为图书馆是实现知识平等、知识自由的保障,从而真正实现知识公正,创建和谐的知识秩序。“公共图书馆制度能够保障社会成员获取信息机会的平等,保障公民求知的自由与求知的权利,从而从知识、信息的角度维护了社会的公正”^[25]，“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有效保障公众平等、自由地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权利”^[26]。在图书馆学理论界,已经竖起了“知识平等、知识自由、知识公正”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图书馆思想启蒙运动。

然而,现实与理想间形成了鸿沟,理论界倡导的“知识平等、知识自由、知识公正”的理想,却招致图书馆实践者的质疑,认为理想者脱离现实,无视中国图书馆的现状,生搬硬套国际图书馆理念,对中国图书馆的发展有害无益。而对大多数图书馆专业人员来说,崇尚理性与知识、尊重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等思想,都是比较陌生的观念。近几年出现的图书馆危机事件则凸现了图书馆实践中对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目标的缺失与漠视。图书馆价值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匮乏昭示了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性与艰巨性。

3.4 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理性作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介工具和手段,是一种方法理性。”^[17]方法理性以理性的特征与功能作为有效的工具去实现科学研究的目的。虽然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欲实现我国图书馆学科学化的目标,在现阶段,其首要任务是采用社会科学也就是图书馆学的母科学的研究规范与研究方法,其次才是考虑图书馆学研究的专门方法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孔德、迪尔凯姆、韦伯等正是借鉴当时已成熟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才使社会科学摆脱形而上学阶段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27],成为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科学门类。发展至今,社会科学的研究虽然进入了多元时期,但客观性和实证性等却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本硬核,“迄今为止,一体化的和实证的科学观仍然是社会科学哲学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人们衡量社会科学是否属于科学的主要标准”^[28]。

美国著名科学学家丹尼尔·贝尔在概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成就时,列举了从1900到1965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和创造性成就,得出结论:“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完全非定量的文献——认识新的模式但没有任何明确的定量问题的含义——在整个时期是非常少的,而自1930年以来特别稀少。”^[29]在图书馆学的研究过程中,只采取纯粹的思辨的理论构建方法与经验描述方法,是不可能等来图书馆学科学化这个愿景的。

科学图书馆学目标的实现,只有采用当前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经验——归纳、假说——演绎的程式,对图书馆学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通过对经验数据的分析与概括,并用可检验的形

式来阐述图书馆学的命题从而构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这对于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现状来说,实在是一条通向科学化的道路,舍此而无它。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科学事业是一项理性的事业。我国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至今还未如愿,其根本原因在于图书馆学研究中理性精神的匮乏。科学图书馆学的抽象性、理论构建及其研究方法都需要理性来把握,需要从本体理性、认知理性、价值理性、方法理性四个层次来构建。

参考文献:

- [1] 蒋永福. 再问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与研究方向问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3).
- [2] [英]贝尔纳. 历史上的科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1:6.
- [3] 孙璐. 科学理性的价值考量[J].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 2004(1).
- [4]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3177.
- [5] [荷兰]斯宾诺莎. 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8:83.
- [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362.
- [7] 张洪齐. 论科学理性的基础[J]. 求索, 1996(4).
- [8] 黎德扬, 吴琳. 科学理性的匮乏[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2(4).
- [9] [美]M·W·瓦托夫斯基. 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 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9: 72-77.
- [10] [美]鲁德纳. 社会科学哲学[M]. 北京:三联书店, 1989: 20.
- [11] 周昌忠. 西方科学方法论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249.
- [12] 赵春旻. 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泛化[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9(2).
- [13] 吴增基等. 理性精神的呼唤[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21-25.
- [14] 刘大椿. 科学哲学通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321.

- [15] 黄纯元. 论芝加哥学派(下)[J]. 图书馆, 1998(2).
- [16] 陆江兵. 技术·理性·制度与社会发展[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7-8.
- [17] 高剑平. 科学理性概念的界定[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
- [18] 蒋永福, 张红艳. 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哲学四定律[J]. 图书馆建设, 2002(5).
- [19] 龚蛟腾, 侯经川, 文庭孝. 公共知识中心与公共知识管理——再论图书馆的本质与定义[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3(6).
- [20] 袁咏秋, 李家乔.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348.
- [21] [美]杰西·H·谢拉. 图书馆学引论[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6:59.
- [22] 徐引篪, 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9:58.
- [23] [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56.
- [24] 肖希明. 图书馆呼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J]. 图书馆, 2000(1).
- [25] 范并思.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2).
- [26] 李国新. 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时代任务[J]. 图书馆, 2005(2).
- [27] 郑祥福. 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走向当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任务[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 [28] 欧阳康.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30-31.
- [29] [美]丹尼尔·贝尔.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1-2.

李林华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通讯地址:浙江金华浙江师范大学。邮编 321004。

金明生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2007-10-09)

●夏义堃

公共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利用的 内涵、依据及优势^{*}

摘 要 公共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利用是相对于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提供与市场运作而言的,主要指非营利性信息机构根据社会信息需求,围绕公众受益和社会效益的原则,以非营利性方式向公众提供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遍和基本的信息服务。公共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利用的依据与背景来自:公共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取向;公共信息资源资产价值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活动的展开;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制度的完善。非营利性信息机构进行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参考文献 13。

关键词 公共信息资源 公益性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非营利性机构

分类号 G253

ABSTRACT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meanings of non-profit utiliza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inks that it is based on the socialization orienta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deepening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s of publ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reuse of the information of public secto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nagement system for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It has advantages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o utilize publ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13 refs.

KEY WORDS Public information resource. Non-profi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LASS NUMBER G253

1 公共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利用的内涵

公共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利用是相对于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提供与市场运作而言的,主要指非营利性信息机构根据社会信息需求,围绕公众受益和社会效益的原则,以非营利方式向公众提供的诸如教育、交通、卫生、就业、文化等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遍和基本的信息服务,以及为提供这些服务所作的各种信息加工处理活动。其基本含义包括:

(1)公共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利用的主体是非营利性信息机构。通常情况下,非营利性信息机构也称公益性信息机构,主要指除政府行政系统外的非营利性信息部门,包括国有信息机构,如图书馆、信息中心、档案馆等部门;也包括民间信息组织。有学者按照公益性信息服务发布主体的不同划分为以下类型:“一是公共信息资源服务,主要是政府信息资源服务的开发利用。二是科、教、文、卫等由政府支持的典型公益性信息资源服务,实行普遍服务的原则。三是社会上的社团组织、协会、行业协会,这类公益性机构用他们的机制提供服务”^[1]。为促进公益性信息资源

的开发利用,各国往往在非营利性信息机构的税收政策上予以政策倾斜,如美国税法第 501 条概括了 25 种适用免税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类型,几乎所有非营利机构都可免收国家和地方的财产税、营业税。此外,一些信息服务商也会提供一定的公益性信息服务,如为用户提供免费的 E-MAIL、主页空间、网上分类信息查询、相关站点链接等,既出于战略营销的需要也含有服务公众的公益思想,但从其公益性服务的影响和范围来看均十分有限。

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除政府系统履行主要公共信息资源宏观管理与服务职能外,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各级信息中心等国家事业单位与民间公益性信息机构等非营利性部门分别承担了相当的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建设职责,是我国社会公益性信息服务领域的主导力量。而事业单位与民办机构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资金来源与运作模式上,在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享有同等的权利。

(2)公共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利用有其独特的激励机制和运作规律。与政府信息服务依靠行政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获取与利用模式研究”(项目编号:07BTQ017)成果之一。

励、企业信息服务凭借市场激励所不同的是,非营利性信息机构具有十分强烈的宗旨/使命特性,其信息服务以公益使命和社会认可为激励手段,采用多元、平等、竞争、志愿参与、相对独立的模式运作,以公正、合理、低廉的价格提供服务。在国外,非营利性信息机构公益性信息服务资格可借助登记声明制、登记备案制以及许可批准制三种途径来认定,我国民间信息机构的公益性信息服务资格则主要通过许可批准的方式获得。需要从概念上予以澄清的是,公益性主要指公共信息服务所形成的社会影响,营利性则指对公共信息服务行为盈利方式的选择问题,公益性不等于信息提供的免费,非营利性机构提供的公益性信息服务并不是免费的,而是指信息机构的活动不以盈利为目的。

(3)公共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利用往往存在一定的经营性活动。图书馆、信息中心、协会、基金会等非营利性机构并非不能盈利,只是按照规则,其盈利不能在成员中进行剩余分配,不能以任何形式将组织资产转移为私人资产,只能用于机构发展,扩大公共信息服务事业。一般情况下,各国对非营利性信息机构的经营性活动往往通过区分相关收入与不相关收入的形式加以区别对待,如在图书馆内开设书店、文印店、小卖店是为用户提供方便,与支持图书馆主要业务相关,以补贴公共开支的不足,属相关收入,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而图书馆利用其资产开设与主营业务相关性不大的经营性活动如高级宾馆、股票证券等,与公共信息服务没有直接联系,则属不相关收入,需要按规定纳税。但在实践中对于相关性的界定并不明确,因而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

(4)公共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利用的作用空间主要是与公众生活紧密相关的基层信息服务,涉及内容范围广泛,是可以共享的普遍性基本信息服务。但无论是信息内容的涉及领域还是服务形式、载体形式以及服务深度等,都为方便用户的使用留有余地。

(5)公共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利用的目的在于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维护信息公平、促进社会信息福祉。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公益性信息服务可分为针对公众的普及性信息服务和针对特定群体的专业性服务,并拥有相关领域的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化的人员队伍优势。

(6)公共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利用资金来源的多样化,除政府作为主要投资方以外,来自企业和民间的捐赠以及信息服务的经营性收入等构成了形式

多样的混合投资补偿机制。根据国内对21家非营利性网络信息服务部门资金来源情况的调查^[2],17家机构依靠国家全额资助或部分资助,占80.95%;5家需要借助营利收入弥补公益性信息服务的不足,仅占23.8%;另有3家依赖基金扶持维持日常运转。

2 公共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利用的依据与背景

(1)公共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取向。公共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的多元参与,即吸纳社会力量完善公共信息服务,非营利性部门及各类社会组织均可加入到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行列;二是公共信息服务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生活、面向市场。

①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活动的社会性。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并不等同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信息活动,不仅要为个体用户提供服务,而且还要为社会共同的信息共享、信息利用提供服务。其社会性意指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直接立足点和着眼点是在社会基层和公众,应以为社会生活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为内容和目标,而不是以营利或完成行政命令和任务为使命。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组织,只要了解公众信息需求、拥有或能够获取一定的公共信息资源,具有参与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和建设的法定资格以及生产和提供公共信息的能力,就具有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主体的基本资格。

②用户及用户信息需求的个性化特征需要包含公益性服务模式在内的多元服务模式。公众和社会基层组织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服务对象,“用户基本状况和要求不仅决定了信息服务的内容与方式,而且决定了信息工作机制与模式。”^[3]不同年龄阶段用户需求和信息素养的不同,加之用户信息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区别,使得用户信息获取及利用公共信息资源的途径也迥然不同,个性化用户需求需要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来适应,公共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利用与市场化运作各有其适应的用户空间和作用范围。

③公共信息服务的市场失灵及政府的低效。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和政府低效导致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社会化取向,由各种不同关注、不同取向、不同动机的人群组成的非营利性信息机构具有政府信息机构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强应变力,能够及时到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提供公共信息服务时往往比政府更加低成本、高效率。因而,来自社会的民间组织和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事业单位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参与者。有学者提出非营利性部门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4],这句话事实上表达了公益性信息服务两方面的特性:它既具有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信息的功能,又以类似私人部门的方式灵活运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信息资源由不同主体提供也是信息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特别是潜在地隐含了经济利益的转移。公众不仅需要有一个善治的政府能够从宏观角度把握调控公共信息资源并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信息服务,而且也需要有代表和反映其心声和利益要求的基层信息组织直接参与公共信息服务。

另一方面,单纯的市场手段难以保证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需要满足为目的^[5]。在现有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难以全面有效地保证社会公平,需要借助社会力量的自我参与、自我服务来实现公共信息资源的社会价值。正如2002年IFLA因特网宣言所说:“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提供了上因特网的主要途径,对一些人来说,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给予他们方便、指导和帮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里是他们上网的唯一途径。”除政府力量外,大量的社会性组织在提供基本公共信息服务方面同样大有作为。

④公共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利用的需要。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分析,社会公益信息资源的重要流通渠道是社会性组织。由于公益信息资源主要集中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社会福利与劳动保障、城市建设、旅游、环境地理等社会公益事业领域,除去政府行政系统对公益信息资源的管理,直接承担具体公益信息资源的收集、生产、加工、传递任务的往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既包括政府拨款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也包括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公益性组织和部分私人信息机构,而且大量的非营利性信息组织实际上是公益性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承担者。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的演讲指出,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信息服务的优势在于“他们熟知民间之所求,了解民间之所有,他们渴望与世界进行信息和思想交流,他们担心本地的文化特性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威胁。”^[6]不仅社会公益性信息

资源的直接对应流通渠道是社会性公益组织,有些政务信息资源还可以转化为社会公益信息资源,借助社会性组织如图书馆、信息中心以及各类协会乃至社区加工传播,供全体成员共享。

⑤推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改革、减轻政府信息服务财政压力的理性选择。西方国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从开始关注政府信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单纯业务管理发展到以后强调与政府业务流程和工作目标相结合的信息内容、信息技术以及资金、人员、设备等的集成管理过程,说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与社会信息生态环境的内在关联,只有在社会信息机构包括非营利性信息机构与企业信息组织健康、有序、规范发展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将部分具体公共信息服务职责转移到社会,从而降低庞大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开支。同时,非营利性信息机构也是监督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行为的重要社会力量。

(2)公共信息资源资产价值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活动的开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公共信息资源作为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一种增长性资源^[7],其资产价值进一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欧盟委员会将公共信息视为信息社会的关键性资源,美国提出公共信息资源是国家战略资产的观点。欧洲议会估算,“电子商务交易所利用的全部数据中有15%至25%的数据基于公共部门信息”^[8]。为促进公共部门信息的再利用,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则,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欧盟先后制定的《迈向公共部门信息开发的欧盟框架》、《公共部门文档再利用和商业性开发指令》、《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指令》等使公共信息开发的实体资格、参与人员、收费原则、知识产权等逐渐明朗,非营利性信息机构在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3)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制度的完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公共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1977年美国联邦文书工作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联邦政府文书费用一年花费是1000亿美元,即使联邦管理与预算局执行文书清除工作也不能减轻这种负担。该是审视文书工作和‘文牍主义’的时候了。”^[9]经过不懈的探索修订,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在美国,《文书削减法》、《公共部门信息准则》、《A-130通告—联邦信息资源管理》等法规制度对政府机构信息管理职责以及政府信息行为等进行了限定,如政府数据和信息利用的“完全与开放”政策为非营利性信

息机构加入政府信息资源增值开发利用提供了可能,同时,各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与收费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公共信息提供的有限责任(以提供原始数据文件为主),政府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加工逐渐向社会开放。

此外,政府在公共信息服务问题上的诸多限制与非营利性信息机构公益性信息服务的种种优势间提供了合理分工的契机:

①政府信息服务的类别限制与公益性信息服务的有益补充。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和公共信息服务总是普遍的、通用的,有特别需求的用户无法得到满足,只有通过其他途径获取。

②政府信息服务对象的大众化限制与公益性信息服务的针对性相得益彰。面向公众提供无差别的信息是政府信息职能的基本要求,而少数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求需要借助相应的社会组织来承接。

③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组织局限与社会触角的无限延伸相互协调。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10],公共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需要有便捷、广阔的信息获取路径,针对不同用户提供服务,而“公共部门在管理信息资源时有自身独有的问题,公共部门管理者比私人部门管理者要处理更大的系统间相互依赖性、更多的繁文缛节、采购硬件时的不同标准以及更广泛的组织外连接”^[11]。

④政府信息服务的结构性限制与公益性信息服务的网络化互为补充。政府官僚化机构的运作特点是按照层级节制体系形成金字塔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处在金字塔式结构不同位置的政府信息部门,其公开和发布信息的范围、内容也会有所区别。而在社会信息服务组织中,各信息主体地位平等,不同信息组织间因业务范围、所属性质等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结构。

由此可见,图书馆、档案馆、信息中心以及协会等非营利性信息机构作为社会信息资源的集散中心,具有辐射面广、门类齐全、信息量大的特点和信息搜集、加工、存贮和传递的专业优势,拥有得天独厚的公共信息服务基础。

3 非营利性信息机构进行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势

(1)来自基层,对基层事务的本能关心促使其具有基层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主动性积极性,无需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2)扎根于基层社会,比政府信息组织更接近和

了解公众信息需求,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性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所提供的信息服务更具针对性。

(3)运转灵活,规模适中,能够快速及时地对公众信息需求做出反应,缺少官僚体制的繁文缛节,公众无需了解组织背后的复杂结构及程度关系,工作程序简便。

(4)非营利性信息机构的公共信息服务专业性强,不求各服务领域的全面开花,而立足于某一个领域或特定人群发挥其专长。如少儿图书馆针对青少年读者、大学图书馆以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为服务对象、科技情报部门以服务于科技创新为宗旨、城建档案馆以城市建设档案的收集服务为主、行业信息中心则依托所在行业开展信息服务。

(5)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与市场开发利用模式间有效协调沟通。有学者认为:“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应成为信息活动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和信息环境的引导者。”^[12]非营利性信息机构具有中立性和中介性质,十分注重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合作,通过承接政府项目、接受政府补贴等不同形式密切与政府关系,能有效利用政府信息资源开展服务。同时,吸收借鉴市场组织高效运行的特点,是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缓冲地带,如行业协会的信息指导行为既联系了政府也面向市场。

(6)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收费低廉,易于为社会所接受。1994年,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明确指出,“公共图书馆是地区的信息中心,它向用户及时提供各种知识和信息”,当然,“保证公民获取各种社区信息”也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使命之一^[13]。

(7)具有广阔的社会覆盖面,与社会的天然联系使得第三部门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提供信息服务方面,尤其是扩大公共信息资源的传播影响范围,具有政府组织所不具备的优势。

(8)可以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进行有效监督,是公共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

参考文献:

- [1] 姜锡山. 专家谈公益性信息服务问题[J]. 数码世界, 2004(1).
- [2] 高寒, 赵俊杰, 刘娅. 我国非营利性网络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抽样调查分析[J]. 情报科学, 2007(5).

(下转第33页)

地与一些图书馆建立联系,将这些图书馆作为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基地。在研究课题的设计、教学内容的设计以及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这些图书馆的实践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也可以应用自己的知识和理论对这些图书馆进行指导,解决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还可以根据图书馆实践的需要,进行项目研究和建设研究。许多应用型学科的建设都离不开基地的建设,图书馆学也不妨学习。第三,他人实践经验的收集和整理,对于教师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资料收集,总结提炼实践经验,也是一种了解图书馆实践的方法。教师不可能全面参与到图书馆工作中去,但是必须关注图书馆的实践,必须在教学中体现出图书馆实践的发展。第四,教师与图书馆员,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当建立起经常交流研讨的机制。通过对图书馆实践问题的交流研讨,启发我们的教学。总之,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注重图书馆实践,注重体现图书馆学实践性、应用性的学科性质。

参考文献:

- [1] 潘燕桃,程焕文.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2] 程焕文等.1999-2003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进展(1)(2)[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4(5),(6).
- [3] 程焕文.高涨的事业与低落的教育——关于图书馆学教育逆向发展的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
- [4] 黄秋梨.关于我国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的思考[J].图书馆学研究,2007(2).
- [5] 吴慰慈.中国图书馆情报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2)[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5),(6).
- [6] 肖希明.变革与发展中的我国图书馆学教育[J].图书馆论坛,2005(6).
- [7] 辛苗.中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危机[J].图书与情报,2003(6).
- [8] 傅敏等.图书馆人才需求与图书馆学教育[J].图书情报工作,2003(3).
- [9] 李荣萍.图书馆学教育怎样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5).
- [10] 于鸣镝.图书馆学家的“八大品格”[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4(3).

杨 勇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通讯地址:昆明翠湖北路2号。邮编 650091。

(收稿日期:2007-12-04)

(上接第22页)

- [3] 胡昌平.信息管理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33.
- [4] 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31-32.
- [5]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10.
- [6]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的演讲[J].世界电信,2004(1):3.
- [7] Dagmar VRÁNOVÁ.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as a Source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OL]. [2007-08-12]. http://www.lida.brandenburg.de/media/2628/Vranova_070515.pdf.
- [8] Jim Wretham, Helen Westhall, Adrian Brazier.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UNLOCKING COMMERCIAL POTENTIAL[OL]. [2007-08-12]. <http://www.opsi.gov.uk/advice/psi-regulations/advice-and-guidance/psi->

information-industry.pdf.

- [9] 樊晓峰,崔旭.从文书消减法看美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得与失[J].图书馆学研究,2006(12).
- [10] 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及其他[J].政治学研究,2001(3).
- [11] [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物(第八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65.
- [12] 王芬,杨书宏.公益性信息服务的转型及其发展策略[J].中国信息导报,2007(4).
- [13] 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5.

夏义堃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通讯地址:武汉市。邮编 430072。

(收稿日期:2007-09-21)